

#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铁证

——读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张连红

---

1999年9月，章开沅先生编译的新作《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以下简称《天理难容》）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继贝德士（Miner S. Bates）文献研究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和《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6月出版）两书之后，又一本全面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力作。这些珍贵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布和出版为深入批驳日本右翼分子的荒谬言论提供了最新铁证。

## 慧眼识珍：章开沅与传教士文献资料的发掘

章开沅先生是著名史学家，他研究的领域虽然很广，但涉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研究领域则是在80年代末之后。198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教会大学史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贝德士教授的文献，更令章先生惊讶的是，该文献中还保留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不断公开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作为历史学家，章先生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这批文献资料的价值，但当时苦于停留美国时间较短，未能有机会认真仔细阅读这些资料。

1991年7月,章先生获得机会再度前往耶鲁。在此期间,章先生几乎从早到晚都坐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阅贝德士文献(绝大部分是英文),这一看就是8个月。在将贝德士文献全部仔细查阅一遍后,章先生从中整理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1000余页。与此同时,章先生还及时将这一重大发现转告了当时美国华人组织的民间团体“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该会首任会长邵子平先生和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女士根据这一线索,于1996年10月终于找到了南京大屠杀时期任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的日记,从而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出于历史责任感,章先生利用从贝士文献中所搜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于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分别在湖北和香港出版了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方面的专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在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贝德士文献和《拉贝日记》成为国内外舆论瞩目的热点。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档案经章先生发掘公布后,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于1996年底举办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史料展。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60周年,在美国吴天威教授和台北郭俊铄先生(均为章先生的金陵学长)热情支持下,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玛莎·斯茉莉(Martha Lund Smalley)女士根据该馆所藏传教士的文献资料,主编了一本《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英文版)。该书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其内容以时间为序,穿插收录了9位美国传教士的有关文献。在该书出版之后,双方商定由章先生在斯茉莉女士所编本的基础上再扩编一本面对中国读者的文献资料。1998年5月章先生偕夫人再度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这次查阅资料的范围从贝德士文献扩大到中国文献项目之其他私人收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和史德蔚(Steward, Albert and Celia)夫妇文献,并复印了相关资料

1000 多页。回国之后,章先生夫妇及刘家峰、王薇佳 4 人经过 8 个多月 200 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劳动,终于编译成《天理难容》一书。《天理难容》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将 10 位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书信和报告等珍贵原始文献集结编译。该书的出版,必将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为驳斥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荒谬言论做出重大贡献。

### 让事实说话:《天理难容》的史料价值

自 80 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右派势力十分猖獗,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不断蓄意曲解,诽谤甚至彻底否认,但是血写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贝德士在 1938 年 1 月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天理难容》第 22 页)作为贝德士的学生,章开沅的这本《天理难容》及先前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南京——1937 年 11 月—1938 年 5 月》一样,都是以挖掘珍贵史料见长,其目的就是要让事实来说话。

在此之前国内出版的许多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有关美国传教士方面的文献,我们一般能看到有贝德士(Bates)、费吴生(George A. Fitch)、马吉(John Magee)、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华群(Minnie Vautrin)、麦卡伦(James H. McCallum)等 6 名传教士的部分资料。《天理难容》中则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如国内学者很难看到的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米尔士(W. P. Mills)、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及史德蔚的资料。前 3 位是当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重要成员。史迈士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的工作

十分出色。他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抗议信,其后又带领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失进行了社会调查,出版了《南京战祸写真: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城乡的调查》一书。这些资料我们现在都在充分利用。但史迈士当时写给家人、朋友的信函和对当时现状的记述,在《天理难容》收录之前,学术界则一直未能挖掘利用。米尔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拉贝回国后接任主席,但学术界关于米尔士的资料掌握亦甚少。这次章先生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档案中将米尔士的材料翻译出版,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福斯特同马吉一样均为美国圣公会的牧师,南京沦陷前一个月来南京圣保罗圣公会教堂服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直留在南京,他担任的职务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秘书,积极参加了安全区的救济与保护难民的工作。章先生的新作第一次收录了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和许多书信。史德蔚虽是南京大屠杀之后才来到南京的,但他到南京后,对一年前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及其所引起的遗留症记录很多,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他在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她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意见。我明白在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大夫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天理难容》第253—254页)这一材料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妇女的暴行。

《天理难容》一书,除首次公布了上述4位传教士的资料外,还大大扩充了原先我们熟悉的上述6位传教士的有关文献,如关于马吉,该书除编译了马吉日记外,还收录了马吉所写的《栖霞山之行报告》和马吉所拍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及解说词,在此之前,国内尚无这些资料的完整中文译本。又如关于华群,一般资料

集中只收录她的日记节译,该书除此之外,还收录了华群女士当时写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立者董事会(设在纽约)、院董事会、吴贻芳院长、德本康夫人和学校同事的两份报告,一份题目为《第一个月的述评》(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13日),另一份为《作为难民营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1月14日—1938年3月31日)。这两份报告详细描述了金女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情况,其史料价值极高。据笔者所查,在金女大校史资料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均未发现这两份报告。

章先生的大作不仅翻译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而且还根据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对已出版的资料做了十分细致的整理校订工作,对以前资料中的误译、漏译和错印等进行了认真订证。如麦卡伦日记,上海《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曾翻译发表,当时该资料来源是上海市档案馆,但英文日记原件上并未署名,该刊以《日军侵占南京目睹记》为题翻译发表,也许是因为原件残破不清的原因,该翻译稿漏译和错译之处较多。其后所出版的一些资料汇编中对此虽有所改善,但仍有不足。如1937年12月31日麦卡伦日记的最后一段,目前已经发表的资料中均漏译,有的资料集则将12月30日与31日两天的日记放在了一天。章先生在新作中对此均进行了增补校正。

章先生不仅对别人已出版的资料进行订正工作,对自己1995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出现的失误也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如1938年4月2日马吉写给美国麦金牧师(Rev. J. C. McKim)的一封信,由于这封信保存在贝德士文献中,信下面亦未署名,当时章先生因时间关系未及考证,误为贝德士写给麦金之信,收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后经马吉牧师长子大卫等人考证,此信确为马吉所写,因此章先生在新作中专门对此作了更正,并在译注中做了详细说明。

## 天理难容: 日本右翼分子的无耻挑衅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铁的历史事实,但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千方百计精心策划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进入90年代之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攻击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原日本兵的日记和回忆录是“自虐”,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证言称作“谎言”;对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抗议报告、日记和书信,他们则认为这是西方人的“偏见”和“阴谋”。《天理难容》一书的出版,无疑是对日本右翼势力一次极为有力的回击。

就史料价值而言,与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写的日记、证言和回忆录相比,第三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则更为客观更为真实。也正因为这一点,当1995年7月章先生所著的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1997年出版的《拉贝日记》一面世,就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一些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学者也曾因此一度噤若寒蝉。但他们经过一度休整后,又开始寻找各种借口进行反击,如他们认为贝德士文献和《拉贝日记》只是当时个别人的记述,带有很大偏见;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所作的抗议报告是出于某种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等等。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分子这一荒谬的言论,章先生利用他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所查阅的材料,将当时留在南京的9位美国传教士及1位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到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共10人的原始资料编译成册。如果两三个人有偏见有预谋还能使人相信,但如果10个人从不同角度讲同一件事,且结论相同,再要说他们都带有偏见,恐怕就是用心险恶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天理难容》,则将“偏见”、“阴

谋”等词送给日本右翼分子无疑是最为恰当的。当时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在1938年3月8日致朋友函中称：“我恨日本人吗？不。我不喜欢他们的政策，我很不喜欢他们对待普通中国人的方式，我相信真理终究会为世人所知，我不想做一个挡路的人！如果我重新面临一次这样的时刻，对日本人做我们曾为250000中国人、妇女和儿童做过的一切，我会同样也再做一遍。”（《天理难容》第345页）马吉在给麦金的函中称其揭露日军的暴行的目的：“是由于坚信应让所有的日本朋友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给日本友人的一份真诚友谊，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信，如果日本多数民众知道在广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真相，他们一定会为之震惊，正如我们亲眼看见暴行开始发生时一样。这些暴行事实可以用来对付日本军方，他们才是冲突的真正根源。”（《天理难容》第423页）贝德士在致朋友的函中说：“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天理难容》第39页）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们都自认为是基督福音的传播者，他们厌恶人类之间的任何残忍无道。出于正义与人道，他们将日军的暴行用日记、书信等方式记录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将此公布发表，有的人甚至在书信的后面还特别注明不要发表。如果日本右翼分子还认为西方传教士们都是带着偏见和蓄有阴谋的话，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天下只有他们的言论才是“公正”的？我们不得不奉劝日本那些“公正”之士不妨坐下来仔细阅读章先生编译的这部《天理难容》吧！

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一件十分艰辛的工作，章先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来查阅这些珍贵的资料，而且还积极将其整理翻译出版，这对于国内许多极少有机会去国外搜集资料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当然，就《天理难容》一书而言，由于该书的资

料来源都是 60 年前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日记、书信和报告,而且大都是未经整理的原始手稿,因此原文中笔误、语句不顺的情况较多,再加上他们按南京方言用英文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很难回译,这都给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通读全书,笔者以为其中一些人名、地名的翻译还可斟酌和核实,部分语句的翻译还可作进一步的推敲,如第 49 页“阿提拉纯然是一个外来者”,译法似可推敲,第 262 页关于《大力水手》的歌词,也可斟酌,如“为了吃我的菠菜”是否应译成“因为我吃了菠菜”。但同这部 45 万字的资料汇编为世人了解历史真相所起的作用相比,这些枝节问题是微不足道的。

(作者张连红,1966 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 《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

由袁成毅撰写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1999 年 10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70 千字,定价 12.5 元。该书内容包括琉球事件——中国该赔日本还是日本该赔中国、甲午战争赔款——中国苦难的加深与日本国力的加强、中国对日庚子赔款及“山东悬案”赔款、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及中国蒙受的巨大战争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与美国的操纵、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1952 年台湾当局放弃对日索赔、日本对部分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及其启示、197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放弃对日索赔等共 9 章。